

## 试论《桃花扇》的主题和人物

吴承业

清代传奇《桃花扇》，是作者孔尚任经过长期酝酿，在掌握了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而创作的一部著名的历史剧。它和当时洪升写的《长生殿》相齐名，故获有“南洪北孔”之称。这部剧作在我国戏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桃花扇》出现的时代，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孔尚任出生时，上距南明福王被俘仅只三年。山东及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层出不穷，当时的明末遗民，有的鼓吹抗清活动，更多的则隐居不仕，对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消极抵抗的不合作态度，孔尚任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物。生活在这种时代和家庭环境里的孔尚任，必然要受到当时普遍存在的抗清复仇思想的影响。作者在出仕以前的这个时期，就为创作反映南明覆亡的戏曲《桃花扇》做了充分准备并开始了写作。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孔尚任出仕后，他本想凭自己的才能做一番事业，但是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而数年的宦海生活，又使他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现实粉碎了他大展经纶的抱负，增加了他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在这期间，他曾因公来往于江淮之间，而这一带地方正是《桃花扇》本事发生的所在。他瞻仰、凭吊了南明的残山剩水，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明末遗民。这些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南明亡国的感慨，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也丰富了《桃花扇》传奇的素材。一六九九年（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经过十余年辛苦经营的《桃花扇》脱稿。这部剧作以其反映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广泛性、深刻性，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以及艺术形象的巨大感染力，立即引起了当时广大读者的注意并在舞台演出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洛阳纸贵之誉”，“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词坛声价与云齐，名满京华受谪宜。”（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桃花扇》脱稿的第二年春天，孔尚任就被免去了官职。可以想见，作者被免官的原因是同《桃花扇》所表达的民族意识和对清政府的曲笔讽刺连系在一起的。

过去评论《桃花扇》的一些文章，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在认识上是不尽一致的。本文想就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桃花扇》以秦淮名妓李香君与复社文人侯朝宗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展示了南明弘光朝廷覆亡的历史。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他在《桃花扇》的《先声》出中又说，作品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本事发生时，由于清兵入室，攻占北京，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是，当时的南明政权还辖有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拥有军队一百余万人，各地农民起义军亦有相当大的力量；而清军入关的旗兵只有二十余万，占地仅有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东的部分地区。双方力量的对比，说明南明王朝还是处于暂时的优势的。如果南明当权者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出发，去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稳定内部，激励人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那么是确有可能战胜异族统治者的入侵的。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在民族危机刻不容发的严重关头，南明王朝内部继续进行着尖锐的派系斗争；最高统治者弘光和当朝权臣马士英、阮大成一伙荒淫无耻，倒行逆施，外镇武将拥兵自重，同室操戈；史可法困守扬州，孤忠无助。这种种史实，在剧本中得到了集中而完整的反映。

《桃花扇》传奇一开始，就展开了复社文人陈定生、吴次尾、侯朝宗等对魏党余孽阮大成的斗争，这实际上是明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派系斗争的继续。代表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黑暗势力的阮大成，正暗藏杀机，窥测方向，企图东山再起。复社文人继承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在斗争中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具有进步的一面。但是，他们面对形如累卵的局势，却感到无能为力，转而消极地去寻花问柳，买醉征歌。他们并没有在政治上同魏阉权宦做坚决的斗争，反而成为被迫害的对象。这说明，封建文人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国家危亡形势的重任的。

在建立南明政权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马、阮为首的一派，勾结江北四镇，企图迎立福王。他们是“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阻奸》出），以立帝为名行争权夺利、飞黄腾达之实。以史可法为首、得到复社文人支持的一派，则反对拥立昏愤的福王，但没有成功。结果是马、阮取得胜利，史可法等希图收复中原的爱国者受到排挤。这样，腐朽的南明王朝自它建立之日起就孕育着行将崩溃的因素。

福王即位，马、阮当权。在清兵大举入侵，北中国已经沦陷的时候，昏庸的福王却认为“外侮不来，内患不生”（《选优》出），不以统一国家为前提而励精图治，只求苟延残喘于江南一隅，整日不理政事，想的是“独享帝王之尊，无多声色之奉，端居高拱，好不闷也”（《选优》出），专心选优演戏，及时行乐。清兵打来，他便携带嫔妃、满载金银珠宝乘黑夜逃跑了。马、阮权奸勾结四镇助威、内待掌握朝廷大权之后，一方面卖官鬻爵，征歌选舞，荒淫无耻；一方面更丧心病狂地结党复仇，排除异己，四出搜捕东林、复社党人。他们想的是：“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这经纶满腹，也无报怨施恩。人都说养马成群，他怎知立君由我，杀人何妨。”（《媚座》出）这就使新建立的王朝愈来愈脱离广大人民，愈来愈陷于孤立。而更有甚者，他们竟卑鄙到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最后在南明灭亡前夕，他们仓皇逃跑之时，仍旧念念不忘“一队妖烧，半车‘细软’。”（《逃难》出）

至于那些握有重兵防御江北的四镇武将，也全不以大局为念，不听调遣，而是骄横跋扈、争夺地盘、互相残杀。这些军阀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就在内哄中互相抵消，这样又谈何抵抗侵略，收复中原呢？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调和的派系矛盾，终于使武昌总兵左良玉发起了内战，造成江淮一带，千里空虚。因此，清军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虽有史可法死守扬州，但孤军奋战，对危局已无法补救。扬州一失，南明王朝也就跟着覆亡了。

剧本对当时历史真实面貌的广泛而具体的描写有力地说明，在昏王当朝、权奸掌柄、文争于内、武哄于外的腐败的危机四伏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明偏安朝廷，本身就具有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整个统治集团已经腐朽不堪，因此纵然有个别象史可法这样比较贤明正



直爱国志士，但也无法挽回这种迅速崩溃的局面。《桃花扇》所揭示的造成南明亡国悲剧的这个封建统治阶级本身的重要原因，是相当深刻的，这是它思想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贯穿和联系整个剧情发展的侯、李爱情故事，是与南明兴亡交织在一起的。作者不仅把侯、李的爱情放在南明兴亡的背景上来展开，而且使这种爱情本身渗入了政治斗争，从而通过这种悲欢离合的爱情，真实地反映出南明王朝的崩溃瓦解，寄寓了国家兴亡的无限感慨。侯、李正是在南明王朝的派系斗争中，由于政治态度的一致而建立起了可贵的爱情；他们也正是在派系斗争的激化中而被迫分离；李香君也正是由于南明统治阶级荒淫无耻、倒行逆施的行为而横遭磨难、备尝艰辛；最后侯、李在清军南下、南明统治者纷纷如鸟兽散的动乱中，虽得偶然重逢，但他们面对山河破碎、国家倾覆的局面，终于中止了炽热的爱情，怀着对权奸误国的切腹之痛、对异族入侵的无限愤慨、对故国江山的深切怀思，而各分南北、走入空门。正如作者在《桃花扇本末》中所说：“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在侯、李的爱情故事中，作者突出地描写了李香君为忠贞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理想，对以马、阮为代表的魏阉余孽进行英勇的反抗和不屈的斗争，因而“碎首淋漓”染下桃花血痕，这显然并不单纯是对坚贞爱情的歌颂，而是体现了更深层的含意。一方面如作者所明白表示的，是为了让读者“啧啧在口，历历在目”（孔尚任《桃花扇小识》）地记住权奸亡国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愤慨于南明腐朽的社会现实而寄托的一种希望，即通过歌颂具有斗争精神的下层妇女李香君的形象，尽情地倾吐“胸中之气”。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作者所说的“兴亡之感”主要表现在对南明亡国的历史经验所作的总结上，表现在对剧中人物的同情与痛恨、歌颂与揭露上，表现在对国家覆亡的怀思上。总之，作者从抒发“兴亡之感”中，集中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因此，从总的思想倾向上看，应该对《桃花扇》传奇做充分肯定。而有的评论文章却认为，《桃花扇》并没有表现出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我认为，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孔尚任的主观意图，又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同时也无法解释作品所引起的强烈的社会反响，其结果势必要贬低作品的思想价值。

但是，我们肯定《桃花扇》的思想价值，并不意味着要掩饰它的糟粕。首先，由于作者的剥削阶级唯心史观的限制，作品在表达南明兴亡这个主题时，仅仅认为“魏党余孽”是“肇三百年帝基”的根源，没有也不可能从当时严重对立的阶级关系上，即从南明统治者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上，来深刻说明它迅速瓦解的根本原因。似乎国家只要有“明君”、“贤相”掌握权柄，不去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封建王朝就能够长治久安。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是违反历史的客观规律的。正因为作者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因此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剧中咒骂李自成起义军为“持刀杀害生灵”的“流贼”、“闯贼”，还把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当作爱国将士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作品的思想内容。作者的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偏见，使他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异族统治者的层出不穷的反抗，不理解他们在反对民族压迫中的伟大作用。认为南明灭亡了，一切希望也就随之化为泡影。因此作品最后写到南明覆亡之时，剧中的人物不是入道，就是归隐，一个个走上了脱离现实斗争的道路，陷入悲观、凄凉和绝望之中。这种悲剧结局的处理，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反抗思想，但却十分消极。

其次，作品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并不是十分彻底的。由于作者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

观念，因此常常把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同对明朝崇祯皇帝的怀念交织在一起。而对满族统治者和清朝社会现实的讥讽总是采用曲折隐晦的笔法，同时还有颂扬清朝帝王和美化社会现实的文字。这固然跟清朝的严酷政策有关，但也说明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这些都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同《桃花扇》的主题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紧密相连的是，孔尚任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和反面的人物形象，从而有力地鞭挞了腐朽、反动的南明统治集团，热情地颂扬了爱国者，表达了鲜明的爱与憎。

剧中的女主人公李香君是作者精心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她是明末南京秦淮名妓，她美丽、温柔、聪慧、忠于自主爱情，在同权奸的斗争中鲜明地表现了嫉恶如仇的反抗性格。在《传歌》中，她一出场就给人以才艺非凡、与众不同的印象。她处于被压迫、受蹂躏的卑贱地位，有着摆脱这种生活处境的强烈愿望。她曾得到当时一些著名的复社人物的赞赏；她的师傅苏昆生又是在复社文人声讨阮大成之后，坚决离开阮家来教唱曲子的，这些人在政治上都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在这以后她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复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她和侯朝宗的结合，固然有双方在才貌上互相倾慕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他俩在政治态度上的一致性。然而这位受压迫、遭欺凌的少女，在政治斗争中却比侯朝宗那样的风流名士表现得更清醒、更勇敢、更坚定。这在《却奁》一出中有着突出的表现。阮大成企图通过赠送妆奁助侯、李成亲的手段来拉拢侯朝宗。侯竟认为阮“情辞迫切”，“不可绝之太甚”，在政治斗争中几乎丧失了原则立场。饱尝痛苦经历的李香君却非常清醒，一开始便对此表示了怀疑，这时她怒斥侯朝宗的动摇行为：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成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

〔川拔棹〕不思想，把话儿轻易讲。要与他消释灾殃，也提防旁人短长。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拔簪脱衣介〕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

这里对权奸的痛斥，对官人的劝戒，完全表现了她的坚定政治态度和不徇私废公、爱憎分明的品质。李香君这种不为富贵引诱、对恶势力表示决绝的刚直行为，教育了侯朝宗，使他悔悟道：“节和名非泛常，重和轻须审详”，于是把全部妆奁退还给了阮大成。这时作者通过侯朝宗的口称赞李香君说：“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

“却奁”以后，李香君不但成为侯朝宗的畏友，而且得到复社文人普遍的尊重。然而对于阮大成来说，这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恼羞成怒，不肯善罢甘休；再加上南明腐朽统治集团对荒淫生活的无耻贪求，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抢夺香君，欲把她做为玩弄和迫害的对象。作品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把李香君推向斗争的激流旋涡中去。《拒媒》一出写在侯朝宗因遭受阮大成的陷害而避祸离别之后，她就“洗粉黛，罢笛管，歇歌喉”；一心等待着终身相托的伴侣。不久南明王朝的漕抚田仰便遣媒来娶她作妾了，而李香君则坚决加以拒绝。她憎恶并鄙弃收买灵魂的金钱，认为“定情诗”可以“抵过万两雪花银”。她忠于理想的伴侣，绝不“入朱门”，表明了她对纯洁爱情生活的坚持。《守楼》一出进一步写阮大成怂恿马士英强迫香君嫁给同僚田仰。从阮大成的话：“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拢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可以看出阮大成等人迫害香君，就



含有对复社文人进行报复的意图。而李香君以定情之物“桃花扇”为武器，坚决地抗拒阮大成对她的迫害；最后竟撞破面容，血染诗扇，以死守楼，有力地挫折了魏阉余孽借此打击复社文人的气焰。李香君对自己年轻的生命并非轻易弃掷，相反她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当她在困难的时刻，苏昆生曾问她：“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肯下楼么？”她肯定地回答：“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她是那样热烈地憧憬着美好的生活，虽然受到现实生活的许多折磨和鞭笞，却始终未曾分毫减损她这种欲望。但当阮大成一伙强行劫夺的紧要关头，她却不惜以死抗争。这不仅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坚贞，更表现了她决不屈从于权奸的高尚品格。

历经磨难后的香君的容貌越显得富有光彩，躯干也越显得矫健了，她随时准备去迎接新的暴风雨的来临。果然，阮、马等又逼她去陪筵。在《骂筵》出中，她把马士英与阮大成比做严嵩和赵文华，她要“做个女弥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决心乘此机会揭露南明统治集团腐朽、丑恶的面目，抒发胸中的愤懑。她当着马士英、阮大成的面，理直气壮地骂道：

〔五供养〕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玉交枝〕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

她悲愤、痛苦、仇恨的情绪全部倾泻出来了，这正是香君这个受南明统治集团重重压迫的人物，代表当时广大人民对马、阮权奸所作的有力鞭挞！当他们把她按倒在雪地上时，香君仍继续唱道：“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她骄傲地以晶莹的冰雪、铮铮的铁石比喻自己的纯洁和刚强。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她表现了多么大胆、勇敢的行为，多么威武不屈的气节！

后来，李香君被马、阮打入内宫，当清军逼近南京时，她才在兵荒马乱中逃了出来。但她依然坚守着对侯朝宗忠贞的爱情，她下定决心：“便天涯海崖，十洲方外，铁鞋踏破三千界”（《逃难》出），也要寻找终身相托的伴侣，结果追寻到了栖霞山中。她虽然隐遁起来了，但是她在疾风劲雨中与黑暗势力搏斗的音容、雄姿却宛然犹在。

李香君这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她在爱情生活和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贞、刚正、勇敢的性格和爱憎分明的感情，使她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感人至深的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剧中的男主角侯朝宗是明末复社的重要成员，是那一历史时期里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既有政治上进步的一面；又有在实际斗争中软弱、动摇的一面。他处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大动荡的时代环境里，他预感到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但是和一般封建知识分子一样，由于自身的剥削阶级的烙印，使他看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可能支持已经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军，去抵抗异族侵略、肃清权奸阉宦、打破黑暗腐朽的政治局面。而复社文人本身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当时危险的局势，这就形成了他思想情绪上的苦闷和彷徨。他所生活在其间的社会环境又充斥着忧郁、沉滞的气氛，似乎令人难以忍受和担荷。这种气氛更加强了侯朝宗精神上的痛苦，在《听稗》出他一出场时就清楚地表达出来。在“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闻”的情况下，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他觅朋访友、游山玩水、吟诗会文、物色名姝，从各方面寻求慰藉。因此，他最初的梳梳香君，也不过是作为风流名士借以消遣苦闷的行径。

现。《誓师》出写在清军侵入淮扬境地、逼近扬州城下，南明的两支主力部队互相攻伐的情况下，史可法只有号召自己的子弟兵坚守城池。但是，由于军心背离，他的三令五申却得不到任何响应。这时，史可法计无所出，愤激痛楚，不禁号啕大哭，直哭得血泪沾襟。结果感动了士兵，他们决心听从号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誓死不降。《沉江》一出则是《誓师》的发展。在清军攻破扬州、生灵尽遭涂炭的形势下，史可法本想“满拚自尽”，但当他想到国家社稷的命运时，就决定“不效无益之死”，于是只身逃脱出来直奔南京。后来在路上才闻讯南京已乱，福王潜逃，眼看江山易主、大势已去，连匡扶社稷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在“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的情况下，怀着对国家沦陷的无比悲痛，跳入“滚滚雪浪拍天”的长江，以身殉国。

史可法的壮烈殉国，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在江边一面哭拜，一面唱道：

〔古轮台〕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

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

这情景交融、动人心弦的唱辞，是对史可法爱国一生的总结，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深切怀念和哀挽，这也是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的表现。

史可法是南明统治集团的一员，在他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和历史的烙印。他的爱国思想中同样杂揉着浓厚的忠君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同腐朽、堕落的南明朝廷做有力的斗争。《阻奸》出，他在反对马士英等人谋立福王的问题上，态度并不是坚决的。福王逃跑了，他认为是“撇下俺断蓬船，丢下俺无家犬”（《沉江》出），极其哀伤和绝望。这种忠君思想的束缚，就使他不但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对农民起义同样是取仇恨和镇压态度。这种局限也就注定了他这孤独英雄的悲剧。

柳敬亭和苏昆生是两个勇敢、侠义、有高尚节操的民间艺人的形象。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下层人物，受压迫、受歧视的境遇形成了他们鲜明的爱憎和是非观念。柳、苏虽一度在阮大成门下当过清客，但当他们知道阮是魏阉余孽时，就毅然脱身出来。柳敬亭宁肯“闲坐街坊吃冷茶”，苏昆生情愿到妓院去教曲，也决不肯取悦于权奸。他们憎恨那些荒淫丑恶的统治者，时刻关心国家大事。他们运用说唱这一武器，以稗官野史做为愤世疾俗、惩恶扬善的材料，充分表露其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和看法。同时，他们还勇敢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不避艰险地投入当时的政治斗争。如在《修札》、《投辕》两出里，为了劝阻左良玉“东下就粮”、扰乱京城的行动，柳敬亭勇敢地肩起投书的任务。在戒备森严的左良玉辕门外，他机智地对付了士兵的盘诘。他面对左良玉慷慨陈述移兵东下之不当，真是如唇枪舌剑，讥锋所向，无可回避，将坐镇一方的左良玉说得无言对答，不得不取消移兵南京的计划。在这里，生动、真切地表现了柳敬亭豪迈的英雄气概、诙谐机变的性格和雄辩的才能。同样，在《草檄》一出里，苏昆生为了营救复社文人，曾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向左良玉求援，以实际行动努力去解除党祸，打击马、阮的嚣张气焰。他们忠义、正直，对于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物，都深表同情并给予真诚的帮助。如柳敬亭同侯朝宗一起逃难，苏昆生为了李香君曾跋山涉水寻访侯朝宗。这种急人之难的精神，确实是很可贵的。南明覆亡后，他们不去“应征”，而是隐身于渔樵之间，依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坚持了民族气节。最后在《余韵》出中，柳、苏深沉



侯朝宗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能够铲除权奸，依靠复社集团革除弊政，实行比较廉洁清明的政治，以挽救国家的危难。这种政治态度，当然有作为封建知识分子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对变革黑暗的政治现实是很不彻底的，力量是微弱的。但也不可否认，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同复社父人一起进行了揭露和声讨魏党余孽阮大成的斗争，受到人们的赞许。但是他在同李香君结合为伴侣之时，由于阮大成、杨龙友乘机利诱，却一度想与阮大成妥协，在政治上表现了动摇。然而他毕竟是复社这一比较进步的政治集团里的重要人物，当他被李香君提醒之后即坚决地同阮大成决裂。以后，他积极参加了南明王朝建立前后的各种政治活动，希图对当时危机的形势有所补救，表现了他一定的才略和家国观念。他曾修书劝阻左良玉率兵东下以免扰乱京城的治安。当他受阮大成的诬陷不得不离开南京后，便到史可法幕中参与军机。在马士英等谋立福王为帝的问题上，他向史可法提出了福王的“三大罪”与“五不可立”，并指出在“迎驾”一事上“怕强藩乘机保立”，“又怕小人呵，将拥戴功挟”。（《阻奸》出）但一当福王登极，他也无可如何，只得自我安慰地说：“无定输赢似奕棋，书空股浩欲何为？”还说什么“前日替史公修书，一时激烈，‘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议”（《争位》出），看来颇有后悔之意。在四镇麇兵争斗时，他从大局出发，尽力调解，把思想情绪集中在国家的命运上。当内哄的局势不可收拾时，他心情十分沉痛：“恨山河半倾，恨山河半倾，怎能重钩。”（《和战》出）但是，在马、阮当权，四镇恣虐，人心离散，南明统治集团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念的情况下，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活动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他更多的则是无能为力的叹息。结果，他不但不能庇护香君，连自己也屡遭阮大成的迫害而被打入监牢。

在一般传奇作品中，对于类似侯朝宗这样的“儒雅风流”的文人名士，多是推崇备致的。可是《桃花扇》的作者对侯朝宗却是有褒有贬，写出了他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并将下层妓女李香君同他作了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批判了他妥协、动摇的严重弱点，这就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封建文人的精神面貌。因此侯朝宗这一形象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但是过去的某些评论，对侯朝宗这个形象是缺乏阶级分析的。往往是局限在民族斗争的范围内，不适当地赞扬他对“国家社稷命运”的关心，没有指出他的家国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农民起义仇恨和对抗的思想。如在《移防》出中，他把农民革命军诬之为“流贼”。他建议史可法让镇将高杰移防开、洛，并亲自监军防河，这固然有消除内哄的动机，但也是为了阻挡农民革命军的南下。这就暴露了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因此对侯朝宗的顾怀家国的思想行为，不应抛开阶级内容而笼统地加以肯定。

剧中的史可法是一位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的形象。作者不为史实所拘泥，着重表现他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顾全大局、忠心耿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优秀品质。作品通过马士英等迎立福王，史可法督师扬州和调解江北四镇的内哄等一系列的戏剧行动，写出了史可法当时的艰难处境：由于当时南明统治集团在走向腐朽和没落，由于权奸马士英等人对史可法的忌恨和排斥，使他上不得朝廷信任，下不能指挥诸将，就连直接统辖的三千残兵，也同样受了腐朽统治集团的影响而军心涣散。当时的整个形势和史可法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孤立无援的地位，使他挽救国家危亡的志向和才能得不到施展。但非常可贵的是，他尽管有无限苦哀，却仍能“忧国事，不顾残躯”（《争位》出），处处以大局为重，坚持抵抗异族侵略，不忘收复中原。他这种爱国的思想和行动，在《誓师》和《沉江》两出有着集中的表

地表达了他们怀念故国的民族感情。

柳敬亭和苏昆生既有共同的品质，又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一致痛恶权奸阉党，反对异族侵略，热爱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并且舍生忘死地扶危济困，但柳敬亭则诙谐、机敏，而苏昆生却淳厚、朴实。孔尚任把这两个形象刻划得有声有色、生动感人。

这里还需要加以指出的是，孔尚任以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为主，写了不少的歌妓、艺人等下层人物的形象。这些人都是为封建统治者所轻视和践踏的，但作者却把他们做为正面人物来表现，倾注了热烈的感情，表彰了他们反抗权奸、关心国事、不做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民族气节。意在说明，“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顾天石《桃花扇序》）；并在同那些祸国殃民、苟且偷安、降敌事仇的封建统治者和沉迷软弱的文人名士的对比中，对后者分别给予有力的嘲讽和贬谪。因此，这是一种十分勇敢的行为，它表现了作者思想进步的一个方面。

同时，孔尚任还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反面人物的形象，直接揭露了南明统治集团争权夺利、腐朽堕落的反动本质。作者把兴亡遗恨都倾注到了南明朝廷君臣上，尤其对进声色，罗货利，赚三百年之帝基”（孔尚任《桃花扇小识》）的魏阉权宦进行了严厉鞭挞。这里有荒淫昏愤的福王，有骄傲专权的马士英，有飞扬跋扈的四镇武将……其中，作者以极其憎恶的感情着意刻划了奸险丑恶的阴谋家阮大成的典型形象。阮大成为了达到追求个人权势和私欲的目的，竟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恶劣手段。他依附魏党，声名狼藉，受到复社文人的声讨，于是就装出一副“改过自愧”的可怜相，心怀叵测地笼络侯朝宗为其说项；同时暗自盘算着：“若是天道还好，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侦戏》出）为了迎立福王，他和马士英狼狈为奸；虚设百官名册，拉拢四镇武将，并甘愿忍辱做个小差吏去迎驾。他极力奉承马士英，以图高官厚禄。为了取宠于福王，他专心选优，甚至“恨不能腮描粉墨，也情愿怀抱琵琶。但博得歌筵前垂一顾，舞袖边受寸赏，御酒龙茶，三生侥幸，万世荣华。”（《选优》出）他就是凭着无耻的献媚和奸诈的手段，官运亨通，一步步爬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他得势后，更疯狂打击异己，欺压人民，无恶不做。为报“却奁”之仇，他对李香君展开了一系列的迫害活动。他不顾异族攻城略地、大举南侵的危急形势，肆意捕杀复社党人。在由此导致左良玉引兵东进的情况下，阮大成却又尽撤江北黄、刘三镇的军队去堵截左兵。他还丧心病狂地唆使马士英一伙，在清军到来时不去迎敌而是逃跑或投降。他们只顾私仇，只为了“保得性命身家”，“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出）作者对这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嘲弄。最后写马、阮出逃后，他们还遭到人民的痛打，马被雷击死于台州山中，阮跌在仙霞岭上，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不仅表明了作者对权奸祸国的极端痛恨，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剧中的杨龙友是一个性格相当复杂、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的形象。他是举人出身，能诗善画，风流自赏。他同马、阮有着较密切的关系，既是马的姻戚，又是阮的盟友，他为了做官也乐于靠拢他们。同时，他跟香君的养母即秦淮名妓李贞丽、复社文人侯朝宗等也有交往。最初他因赏识香君的色艺，就帮助她同侯结合。而当阮大成受到攻击时，他又为其出谋，通过向香君赠送妆奁来拉拢复社文人，以摆脱困境。他还参与了迎立福王的活动。但是，虽然他同马、阮有联系，作者却并未把他作为同样的反面人物来对待。在左良玉欲引兵南京时，



他尚能想到“休教铁锁沉江底，怕有降旗出石头”，担心由此发生内哄，招致敌人侵入，于是急忙找侯朝宗修书劝止，并对侯说：“吾兄素称豪侠，当此国家大事，岂肯坐视。”（《修札》出）可见他对国家大事表现了一定的关注。李香君的“却奁”使他感到难堪，但是当侯、李面临逆境的紧急关头，他还是尽力加以保护，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如，在《寄扇》出中，她将香君洒在定情诗扇上的滴滴血痕点染成折枝桃花，还请苏昆生为她去寻找侯朝宗。后来在《骂筵》出中，李香君因当面痛骂马、阮而惨遭蹂躏时，又是他巧为周旋、难中相救。杨龙友通过实际观察和体验，对马、阮权奸的丑恶行径逐渐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在《题画》出中，他向寻找香君的侯朝宗表白自己的认识和态度：“而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俺虽至亲好友，不敢谏言。”并劝侯说：“世兄既与香君有旧，亦不可在此久留。”可见，他既不满于马、阮权奸，又不敢得罪他们；同时对朋友的不幸境遇亦表示了一定的关切。

总之，杨龙友跟当权和在野的人物都有联系，处事非常圆通，在政治斗争中态度暧昧。但是，他还没有助贼为虐，尚能够对受迫害的人们给予救助。因此，作者是采取有褒有贬、寓褒于贬的态度，有分寸地、真实地刻划了杨龙友这个性格复杂的典型形象。从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中，也说明了那些为非作歹、一意孤行的权奸阉宦马、阮之流，是多么不得人心，处境是多么孤立，他们真是卑劣到了极点！

《桃花扇》传奇广泛、真实地描写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精心地塑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主题。这就是作品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由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了人们，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今天看来它也仍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因此，《桃花扇》不愧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悲剧。